

辛亥革命運動中 日本軍人的對華“民間外交”

——以青柳勝敏等人之活動為中心的考察

趙 軍

[提 要] 本文透過青柳勝敏撰寫的《意見書》及其附錄《支那革命黨現狀》，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一部分日本現役、預備役軍人參與辛亥革命運動和策劃“滿蒙獨立運動”的真實動機、目的，以及青柳等人的活動對辛亥革命和近代中日關係的演變所帶來的影響。青柳等人所謂的“民間外交”活動，歸根結底仍是近代日本對華“多元外交”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 青柳勝敏 日本預備役軍人 浩然廬 辛亥革命

[中圖分類號]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1 - 0191 - 12

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有一份署名“預備陸軍騎兵大尉青柳勝敏”撰寫的《意見書》及其附錄《支那革命黨現狀》。該資料反映和澄清了迄今為較少為人論及的日本現役、預備役軍人或參與中國辛亥革命運動，或策動以分裂中國領土、主權為目的的“滿蒙獨立運動”等陰謀活動的動機及其歷史環境和政治背景。透過這份資料，人們可以從更多的側面再現辛亥革命時期中日關係的全貌，對辛亥革命運動中的“日本元素”的各個側面取得更完整的理解。

關於青柳勝敏其人及其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現有研究著述所論大多集中在兩個時段：一是“二次革命”期間青柳曾參加李烈鈞的江西討袁軍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在東京創建培養軍事指揮官的“浩然廬”（浩然學舍）時，聘請青柳勝敏等12人負責軍事教育；二是袁世凱復辟帝制前後，以肅親王善耆為首的宗社黨聯合蒙古“馬賊”頭目巴布札布父子，勾結日本大陸浪人川島浪速等人發動所謂“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之際，青柳等人受川島的委派，從前期的幕後策劃、武器彈藥運輸到後期親臨戰場參與具體作戰指揮等方面，參與了這場旨在分

裂中國領土的陰謀武裝行動。由於辛亥革命運動期間從不同角度參與過中國革命運動的日本現役、預備役軍人不下數十名、上百名，甚至有一些人戰死在中國，青柳在其間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並不是十分突出，故此前並未受到史家們更多的關注。關於第一個時段青柳等日本預備役軍人參與中國革命運動的動機，也大多以“這些退役軍人（按：預備役指結束現役後在一定期間裡服的常備兵役，並不等於退役——引者）並非受日本軍部之指令，而是出於個人自願，改名從事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的”等較為籠統的表述加以概括。^①

關於青柳勝敏本人的經歷及其參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經緯，在已經刊行出版的史料中，確實沒有太多的資料可供查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冊的《青柳勝敏傳》部分，應當是最基本的介紹：

青柳勝敏（陸軍大尉，[曾參與]滿蒙獨立運動） 明治 12（1879）年 5 月 10 日生於秋田縣北秋田郡大館町……經（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33（1900）年畢業，翌年被任命為陸軍少尉；……42（1909）年任騎兵第八連隊中隊長（連長），從這個時候起提倡大亞洲主義，並與中野天心（中野常太郎）和印度志士巴拉卡拉等人交往。43（1910）年以大尉銜退出現役，創辦《大東》雜誌，專心呼籲亞洲各民族的團結和覺醒。……45（1912）年為江西省都督李烈鈞聘為顧問前往支那，參與策劃江西獨立計劃，並在革命發生後為在該地建立一個能夠支配支那大局的勢力而效勞。然未幾發生宋教仁暗殺事件，以此為契機出現南北分裂，李烈鈞欲在江西打響倒袁第一槍，青柳出任江西軍參謀長，並與山中峰太郎一起登上二次革命的大舞臺。事敗後與李烈鈞同赴東京，在大森新井宿成立學舍起名‘浩然廬’，以李為社長，青柳自任副社長，收容流亡革命者八十餘人，實施軍事等教育……該校後來由於學生在千葉縣進行爆炸試驗時發生意外的爆炸事件，結果被迫關閉。

大正 4（1915）年蒙古的巴布札布派遣特使前往日本，希望援助清朝復辟。此時，青柳率先策劃援助方策，並試圖與肅親王和川島浪速等人建立聯繫。同年 11 月，在蒙古特使的陪同下偕同木澤暢大尉等人前往蒙古，在哈拉哈河畔造訪巴布札布軍大本營，視察了該軍的實際狀況，更增強了援助蒙古軍的決心。5（1916）年 1 月回國，而後同川島浪速等人多次謀劃，並致力於籌措武器彈藥和軍事行動的資金，推動所謂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5 年 4 月再次前往哈拉哈，同巴布札布磋商後，一度返回旅順，將武器彈藥等運往哈拉哈，而後伴隨肅親王的七男憲奎王第三次前往哈拉哈巴布札布軍的大本營，同巴布札布率領的三千蒙古軍一起，大張旗鼓地向滿洲進軍。當時，青柳努力完成身負的重要領導任務，統帥蒙古軍秩序井然地進軍到滿鐵沿線的郭家店附近。然而在此期間，圍繞滿蒙獨立計劃的根本大局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巴布札布軍不得不放棄計劃返回蒙古。青柳強忍萬般悔恨繼續從事武器的補給工作，蒙古軍撤退後又留在獨立運動舉事總部參與樞機策劃。6（1917）年秋，同蒙古軍的關係斷絕後，（青柳）又全力指揮朝鮮人向滿洲擴展的活動，在奉天創辦‘共榮社’，從事保護朝鮮人、對支那人進行文化指導等活動。與此同時，又對我國的羊毛政策表示關注，研究在滿蒙發展牧羊事業的方法。但是晚年（的青柳）跟健康無緣，其抱負尚未實現，不幸於昭和 9（1934）年 9 月 7 日長逝。享年五十六歲。……^②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是為所謂“東亞先覺志士”樹碑立傳的書籍，為了“顯彰”其所謂“經營大陸”的“功勞”，不惜掩蓋傳主們侵略、擴張活動的種種劣跡。不過按照這篇傳記的記述梳

理一下青柳勝敏同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發現可以具體地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一是退出現役後不久就創辦《大東》雜誌，主要通過著述呼籲“大亞洲主義”；二是辛亥革命爆發後輔佐李烈鈞在江西的軍事行動以及二次革命後在日本創辦浩然廬；三是策劃和參加所謂“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受挫後依然援助巴布札布軍直到最後潰散；四是1917年以後到我國東北地區從事言論、文化活動，同時伺機在“滿蒙地區”發展牧羊事業。

作為一名職業軍人，青柳勝敏跟同期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的杉山元、畑俊六、小磯國昭等人比較起來，在軍隊裡的仕途確實很不順利^④，退出現役之後參加和策劃的種種活動，也大多以虎頭蛇尾的方式結束。但是貫穿他這些活動的宗旨、理念何在？他本人撰寫的《意見書》及其附錄倒是給人們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解答。

二

青柳勝敏的《意見書》為手寫體版本，非正式出版物，但原件封面有一行毛筆字標明“大正三年八月四日持參（意即親自帶來）”，可知為青柳本人在1914年8月前後完成並親自提交給日本外務當局或者參謀本部的資料。日本外務省檔案中警方對孫中山的監視紀錄表明，從這一年的1月到8月前後，青柳多次出入孫中山在東京的寓所，並就中國革命黨人在日本的活動向媒體做過有關披露^⑤，因此也可以知道這正是青柳勝敏跟中國革命黨人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意見書》首先從日本同歐美列強在中國角逐的現狀展開分析：

近時歐美文物發達，且將全部視線傾注於東亞未開化之地的支那。或公開或隱蔽運用一切方法手段以獲取利權，並奠定政治上、財經上強勁有力之基礎。而我國雖然擁有強大之軍備，由於財政上之不備，在平時的競爭場上常瞠目於歐美之後。這對於（我國在）大陸之發展以及奠定我國立腳之基礎，誠乃遺憾萬千。然而，此次歐洲之大亂，實乃天賜之良機。可使我國脫離危機，進而奠定百年之壽，實乃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

故此，吾人當此之機遇，須深思熟慮，全力籌劃制定東亞發展之策略。……若失去此次機會，實在不知何時才能再度圖謀我國之發展。此次舉動，決不可看作趁火打劫般的行為，而應看作把握住我國發展良機的天賜之福。……然而，這裡尚有一言必須相告，曰：對於支那領土，不可存一絲一毫的瓜分慾望。（不然，）將來無論何時一旦需要同歐美白色人種之間決定勝敗的時機到來之際，都有可能給（我國的）巨大抱負，即通過亞洲人種之團結拯救我國的危機，建成亞洲人種發展之基礎的大事業，帶來至大的障礙。數年前，我國合併朝鮮之際，亞洲一般人士之感情甚為不快。因為彼等期待將來一旦時機成熟，借助我國之幫助以定建國之大計。而我國採取吞併領土之行動，遂使彼等悟出以貴換賤之愚蠢，於是其人心逐漸遠離我國，局面為之不利。余由此堅信，為實現我國擁有亞洲各州遼闊大地之雄偉抱負，須隱忍，且不得不放棄偷竊和搶劫之類的小謀小策。然而，當如何利用此機會使彼等順應我國之政策呢？余堅信，顛覆（近年來）翻弄遠交近攻之手腕、頻繁牽制我國的袁政府，建立對我國採取親善政策的（支那）政府，使其依賴我國維持支那的安寧秩序，其間大力扶植我國之利權、勢力，應為我國最首要的方策。因此，應當徹底廢止去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期間我國官廳各行其是，民間行為也各不呼應的分散性手段，採取舉國一致的大方策。非此，（對華政策）仍然會以龍頭蛇尾而告終，沒有任何裨益。^⑥

青柳勝敏的這段論述，語言表述雖相當凌亂和殘缺，但歸納其主旨則不外以下幾點：第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日本帶來了在中國大陸擴張權益的“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日本一定要把握這個時機採取“勇敢”而“斷然”的行動；第二，擴張在中國的權益，不需要採取直接瓜分中國領土的行動（儘管青柳本人幾年後就忘了這個策略），因為那樣做會失掉亞洲各國革命者和獨立運動志士對日本的期待感，不利於日本“通過亞洲人種之團結拯救我國的危機，建成亞洲人種發展之基礎的大事業”亦即所謂日本版“大亞洲主義”、“亞洲共同體”的最終目標和理想；第三，實現以上兩點目標的具體措施就是推翻對日本並不馴順的袁世凱政權，在中國扶植一個親日政權，而後通過這個傀儡政權在中國“大力扶植我國之利權、勢力”。如此，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擴張權益就可以借助歐洲大戰的時機得到大大的擴展。

諸多史料表明，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的無暇東顧看作發展日本在華勢力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其實是當時日本朝野內外眾多謀士、政客們的共同主張^⑥，也是日本政府後來實際上付諸實施的重要政策。而青柳勝敏本人能夠在戰爭爆發後不滿一個月的較早時機就提出此類主張，反映出他在這些問題上敏銳的嗅覺和洞察能力。包括青柳《意見書》在內的來自民間和軍隊內部這類主張的大量湧現，對日本政府制定和實施強硬的對華政策無疑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反對參與瓜分中國領土的行為，也是日本國內一部分“支那通”們多年來堅持的觀點。尤其是民間的“支那通”們，在這一點上時常同軍部的強硬而“短視”的對華路線和政策形成尖銳的對立。因為在這些“支那通”們看來，日本即便是按照一部分軍部首腦的主張，趁其他列強忙於歐洲戰亂之機瓜分到一部分中國領土，獲得一部分直接利益，但卻丟失了一旦機會成熟霸佔整個中國領土的機會，反而得不償失。青柳以一名預備役軍人身份為日本外務省獻上的具體對華政策有兩點倒值得注意：第一，袁世凱被看作日本擴大在華侵略權益的大敵，推翻袁政府、建立一個親日的政府在青柳看來已經成為當務之急。青柳本人為何在這一時期如此積極地援助孫中山等人在日本的活動，答案自然應當從這裡追尋；第二，在對華政策上提出了要求採取“舉國一致”姿態的呼聲，這實際上是在呼籲改變日本政府與軍部、日本政府與民間、日本軍部與民間等多重勢力在侵華方針、策略上缺乏策應甚至相互掣肘的局面。

至於如何在中國“大力扶植我國之利權、勢力”，青柳還提出了一份政策清單：

當此之際，應斷然採取舉國（一致的政策），援助南方革命黨，不斷向其提供（軍事的、經濟的等多方面）的動力，（採取）援助其事業的方策。待其大功告成，可獲得下述各項權利：

- 一，完全開放“滿洲”東部和蒙古，獲得邦人（即日本人，下同）移居之特權；
- 二，獲得“滿蒙”礦物採掘權；
- 三，為了應對開放地區邦人的危機狀況，特別約定我國享有創辦警察之特權；
- 四，自安東縣經懷仁、通化，至海龍的鐵道修築權；
- 五，自浙江省溫州至常山至福建省延平的鐵道修築權及自福建省福州至江西省南昌的鐵道修築權；
- 六，自福州至廣東沿海岸的鐵道修築權；
- 七，江西省南昌的開放及居留地的佔有，以及九江居留地的獲得；
- 八，上海及南京居留地的獲得；
- 九，寧波的開放；
- 十，支那各省日華共同開採礦物的採掘權的獲得；
- 十一，軍隊及各學校裡僱用、招聘本邦（指日本，下同）教官之特權；

十二，長江漁業權（的獲得）。

眾所週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時間是1915年1月18日。而在二十一條要求的醞釀過程中，日本外務省、陸軍、元老、民間先後分別提出了各種對華政策方案不下幾十件。⁹從時間上看，民間方面最早提出這類方案的當屬青柳勝敏。青柳提出上述《意見書》後，東亞同文會（9月1日）、對支聯合會（10月6日）、黑龍會（10月9日）、小川平吉（11月7日）等團體和個人陸續向日本政府提交各自的方案。從青柳在對支聯合會等團體中的活躍程度來看，不排除他的“上書”行為對其他民間團體和個人的“進言”發揮了“啟迪”作用的可能性。

青柳勝敏的《意見書》跟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相比，內容既粗放，著眼點也較為單純。但是這份《意見書》中提到的鐵路修築權、日本人的移居權、漁業權、採礦權、警察權、招聘外國人教官的優先權等內容，或多或少都在二十一條要求中得到了體現，有些甚至還超出了二十一條要求的範圍，可見這份堪稱二十一條要求原型之一的侵略計劃的野心之大、危害之嚴重。當青柳還在以“浩然廬”副塾長（塾長為陳其美）的身分為中國革命黨人培養起義軍官的時候，他已經在心目中構建起了系統而全面地攫取中國權益的藍圖。

在《意見書》的末尾，青柳勝敏又以一個職業軍人的眼光推測了歐戰結束後英、俄、法等國重新將勢力向“東洋”“波及”之際的局面，並了那個時刻來臨時日本應當注意的事項和採取的對策：“吾人認為，當此之際，應宣告保持嚴正中立，不使歐洲的大亂波及東洋。若有一意孤行之國家，則我國將無論對方是何國，堅決以武力遏制之，以盡我國以一國之力量確保東洋和平之重責。因此，吾人堅信，利用目前之良機，傾注全力致力於支那問題之發展（意即全力發展日本在華勢力之意——引者），就是（日本的）上策。”總而言之，一旦到手的權益，就決不放棄，不管對手是如何強大的任何一個國家，日本都必須與之決死對抗。而為了保證在即將到來的對抗中操有勝算，就必須利用目前的時機在中國攫取最大限度的權益。短短的幾句結語，暴露了一個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對東亞地區國際局勢的冷靜而透徹的判斷和對侵華權益的狂熱的執著。

三

《意見書》附錄的《支那革命黨現狀》，包含著青柳勝敏以下兩個目的：一是從內部向日本政府當局通報中國革命黨人的現狀，二是匯報自身的計劃，爭取來自政府的財政和軍事支持。

關於中國革命黨人的現狀，青柳分析道：“去年第二次革命以來，革命黨的根據地被袁世凱從根本上加以蹂躪。再加上支那平民慣於屈從強者，不惜阿諛奉承，而對昨日之革命同志今日可以翻臉視為敵人，激進革命黨之基礎今日看來已經完全喪失。然而，若以此判斷支那已經統一或者統合，（則為時尚早。）彼等最重要的地區，是江蘇省的淮安、安東、徐州一帶，以及浙江省湖州、安徽省泗州、鳳陽一帶。為了討伐江西省之白狼，（北京政府）已派出一個混成旅。但都督和龍師長之間甚不和睦，龍師長遠離戰場，率領其部滯留九江。在南昌只留下了憲兵和巡警等，且憲兵隊不少成員心向革命黨，因此，江西出身的革命黨正計劃利用彼等在城內發動起義。”“湖南省是革命黨、綠林之巢窟，加之去年李烈鈞、林虎的遣散士兵以及湖南的遣散士兵大多攜帶武器遁入山間，現今時時發生暴動，其勢頗為猖獗。另外，林虎部的營長某率其一部官兵，漸次退向廣西邊境，有同廣西綠林合併之勢。”“目下，林虎正在同岑春煊之間從事交涉，若交涉告成，張勳有所舉動，則長江一帶當有大的變動。”

上述情報，一概沒有註明來源，應當是青柳勝敏借棲身於革命黨人內部之便，綜合內部和外部各方面情報作出的綜合性分析。關於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陣營凋零的士氣和分散而凌亂的鬥爭現狀的分析，用辭雖然尖刻，但也切中了革命黨人當時的短處所在。

基於上述分析，青柳勝敏的結論是：“要言之，現今之革命黨已成為無重大實力之存在。因此，彼等無法依靠自身力量舉事，唯有等待袁氏之失政或者金融崩潰、各地亂黨起事後，乘機而舉事。或者依靠日本等第三者的大力援助（主要為金錢和武器彈藥），不然則終究無法獲得重大之效果。吾人堅信，當前之急務，就是應當借鑑歐洲大亂之頭緒，大量地（對革命黨）提供援助，推動其迅速、果敢地實行。”一方面，是運用大量的耳聞證據說明中國革命黨實力軟弱，已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在中國國內的政治舞臺上開展大的政治運作；另一方面，又著力強調革命黨不能沒有外援，而日本如果要實現打倒袁政府建立親日政權的目標，又不能不依靠革命黨人起事的相互依存關係。這樣，青柳勝敏就為自己在《意見書》中提出的結論，找到了所謂的“根據”。

既然把援助中國革命黨人的活動看作一場有利可圖的交易，就少不了對投入和預期回報值的大致估算。然而，革命和政權更替是一種複雜而且充滿變數的政治運動，心中並無確實把握的青柳勝敏在這個時候只能先拿出第一期的援助金額估算：

一，孫文一派主要在長江沿岸各地舉事，據了解，同一派的陳其美已暗中將其觸角伸向“滿洲”，步步實施其計劃。但現狀是資金不足，若聽任其自行發展，則自今春以來實行之計劃必將化為泡影。彼等若有五十萬元資金，就易於在長江一帶開展擾亂活動；

二，林虎欲以廣東、廣西為根據地舉事，去年秋天流亡以來，已開始這一方面的活動。已花費近三萬元資金，將來如有三十萬元左右的資金，這一方面的活動將大有可觀。

這裡雖然沒有說明所需資金額計算方法的根據，總算還提出了大致的數據。至於“滿洲”、廣東、廣西等地的革命黨人如果按照計劃起事之後，還需要開展什麼樣的後續動作，青柳就只能提出更為約略的猜想，而拿不出稍為詳盡的計劃了。⁹

最後，青柳勝敏以“結論”的方式，提出了他利用革命黨人在各地舉事，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以便日本從軍事上、政治上全面插手中國內政的全局性構想：

今後應採取之方策，是利用林虎在廣東、廣西的現有勢力，首先促使彼等在此舉事。如此，則雲南、貴州、四川起事便容易得手。然後，使此數個根據地獲得獨立、鞏固之地位，逐步向長江一帶擴張其勢力。長江以南各地則易於望風起事。為此，應當以廣東省北海或者大觀港為軍需品卸貨之基地，迅速向廣西省輸送武器軍火，以利於在該省以及該省與廣東省交界之地附近起事。

另外，為保證這一計劃得以實現，勢必要仰仗（日本）海軍的力量。因此，我國應動員全部國力，一致參與這一計劃。海軍可向革命黨提供數艘即將廢棄的軍艦及驅逐艦，並派遣一部分預備役海軍將校和水兵等訓練指導彼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在北海或者大觀港的地位，余堅信其效果將極為顯著。如果能逐步提供至少以預備役編成的一個混成大隊左右的兵力（按日軍編制的一個大隊即一個營——引者），則不難期待萬全之效果。與此相關，還應當援助孫文、陳其美一派正在計劃的騷擾行動，以牽制或者誘發以兩廣為基地起事的林虎等軍，擾亂長江一帶。為此，可以將江蘇省雲台山附近沿岸闢為此翼的兵站基地，補充其武器彈藥。如此，則其效果將更為顯著。這一帶土匪和

軍隊均使用三十年式樣的步槍，且彈藥緊缺，非此難成大事。

此外，在與我國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滿蒙地區，應聯絡革命黨與宗社黨（原註：如陳其美一派正在計劃及已付諸實施的一部分），利用當地的馬賊，令其崛起（原註：令其在我駐屯軍隊或者□□（兩字無法辨認）地附近放火掠奪），我則利用這一機會，尋求在滿蒙的發展，採取斷然之措施。或者暗地裡以兵力援助革命黨，打擊官兵，助長宗社黨和革命黨勢力的發展。

如上所述，在長江一帶的騷擾、在兩廣地區的崛起以及在滿蒙地區的活動，三者相互呼應，同時發動，則各地白狼式的土匪們也會群起暴亂，支那全國遂陷於紛擾之中。於是，我可利用這一機會推倒袁政府，樹立對我國採取親善政策之政府，並宣佈我國將保護支那和平民眾的生命財產，在有必要的各地駐紮我之兵力。如此，不僅支那的和平有望，將我國勢力擴展到支那全國，獲得利權和商業上的發展亦指日可待。

青柳勝敏為日本政府和軍部構建的這一計劃如果加以實施，雖然未必會對袁世凱北京政權造成致命的打擊，卻無疑會在較大的範圍內造成嚴重的混亂，也必然會給日本借機擴大在華權益提供必要的藉口甚至可資直接利用的機會。然而這一計劃又存在著整體操作難度太大的缺陷和強行將革命黨人與宗社黨、馬賊、各地的土匪撮合成一支反政府武裝等一廂情願的因素。因此，青柳的提案並未為日本政府和軍部所採納。數月後，大隈重信內閣直接向袁世凱政權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倒袁護國運動也以青柳勝敏們完全預料不到的另一種方式在全國展開。

四

青柳勝敏為日本政府獻計獻策的行動，同他在這一時期參與中國革命黨人在東京的活動其實有著內在的密切關聯。“浩然廬”或稱“浩然學舍”從開學到關閉的短短的歷史，就是這場“同床異夢”般的合作的一個縮影。

“浩然廬”作為培訓中國革命黨人軍事人才的一個據點，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日本警方和憲兵隊的密切關注。如《外務省紀錄乙秘第一二七二號》中匯報說：“（東京）府下荏原郡入新井村新井宿一千二百六十六番地所在浩然廬，乃西本願寺傳教師水野梅曉同情支那流亡者之困境，收留其青年子弟，施以教育為目的於大正2（1913）年12月設立的私塾。預備騎兵大尉青柳勝敏為主持者，轄下有六名本邦人（日本人）任教師。自內部參與其經營者，有陳其美、李烈鈞等人，支那流亡者殷汝驪擔任其監督。眼下有學生四十九名，預備第三次革命一旦爆發，即使用這些學生。尤其是近期以來，正在切實作此準備。”^⑨從這條資料的行文來看，“浩然廬”名義上的“塾長”雖然是陳其美，但由於教員、教材等均由青柳勝敏找來，課程等也由青柳等人決定，青柳當為“浩然廬”事實上的“塾長”，無怪乎日本警方有時就直截了當地稱呼“浩然廬”為“青柳塾”。另據日本內務省當時探查到的情報說：

浩然廬 一，實際經營者及有關人員之姓名：實際負責經營者，乃支那人殷汝驪（流亡者）與日本人青柳勝敏（預備陸軍大尉）兩人。其他支那人石介石、吳仲常、周哲謀、陳勇，日本人杉山良哉、門馬福之進、一瀨斧太郎、江口良太郎、海原宏文、青木繁、可兒伍三郎、西川德三郎等十二名擔任其教授。二，學校維持之方法：大正2（1913）年12月1日開學，現有學生七十九名，全部住宿舍（集中住宿，分住五處的宿舍裡）。每月繳納伙食費及其他所有費用十元，以充維持費用。不足部分則由旅日支那人中有志之士捐助解決。三，學生之種類：學生全部為支那人，現有學生中三分之一參加過支那

革命，其他為一般支那留學生。四，教育方針與方法：教育之方針主要在於灌輸日本軍事教育，學生分為甲乙二班，同時以日語講授法律、政治、經濟學及武術等。^⑩

另據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柴勝三郎致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情報，由青柳勝敏網羅來擔任教員的這批日本軍人的軍銜是：一瀨斧太郎（預備騎兵大尉），中村又雄（預備步兵大尉），杉山良哉（預備步兵中尉），門馬福之進（預備輜重兵特務上士），可兒伍三郎、江口良太郎、海原宏文、西川德三郎（均為預備炮兵特務上士）。然而同一份情報又稱，這些軍人在浩然廬使用的都是假名，如一瀨大尉自稱山本大尉，杉山中尉自稱齋藤大尉等，以便隱瞞自己的真實身分。由於中國革命黨人的經費極度困難，這些軍人們均以“革命軍勝利之後可以得到相應官職”為條件，同意暫時不要報酬，無償工作。^⑪

1914年6月27日發生的“浩然廬”意外爆炸事件，使青柳勝敏和“浩然廬”一舉成為日本官方矚目的焦點。據憲兵隊29日提出的調查報告，爆炸事件的當事人是休職工兵中尉野口忠雄和浩然廬的中國學生趙宇臣（別名趙堅），兩人於“28日下午2時左右在旅館三樓客房裡製造炸藥的時候，突然發生爆炸。中尉四肢受傷，趙兩腳數處受傷。兩人生命均無危險，目前正在千葉縣立醫院住院治療。……野口中尉於6月12日在浩然學舍會長、騎兵大尉青柳勝敏邀請下擔任該學舍的教官兼寮監（宿舍管理人——引者）。趙於去年10月來日，眼下為浩然學舍之學生，與野口中尉純為師生關係。……關於此次製造炸彈之目的，據稱是為了歸國後糾集同志前往西伯利亞，爆破鐵道，阻止白色人種的擴張云云。”對於這個案件，日本政府當時的處理辦法是：“趙宇臣交由千葉地方法院處置，野口中尉由憲兵隊辦理送交軍法會議審理的手續”^⑫。

對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的動向，袁世凱的北京政府一直予以密切的關注。日本預備役軍人參與革命黨人的“造反”活動，更使袁政權感到緊張。如1914年1月10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駐北京的坂西大佐發給參謀總長的“坂極秘第一號”電報稱：“大總統（指袁世凱——引者）曰：據報，近來李烈鈞、柏文蔚、張饒景、何海鳴等在東京附近池上組織軍事協會，進行軍事教育，二次革命流亡者約五十名為其會員，日本預（備）後備（役）將校擔任各科目教官，胡瑛擔任革命史的講授，戴天仇、陳其美擔任精神講話，以六個月為修業期限，並揚言今年夏天舉行實地演習，意氣頗為昂揚。余思此事恐非事實，但必定有所由來，不知閣下以為如何？小官（坂西大佐的自稱——引者）自然全部予以否認，並答應向有關方面詢問。支那方面的諜報固然難以相信，但萬一其中一部分內容並非捕風捉影，則（我方）必須有所說明，才可化解彼之疑慮。”當時的日本政府、軍部雖然已經通過警察和憲兵對中國革命黨人創辦的政法學校和浩然廬等教學設施進行著密切的監視，但顯然是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授袁政府以把柄，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於是指示坂西大佐用下面的措辭回答袁政府：“日本政府對於流亡革命者採取嚴厲的取締措施，我預（備）後備（役）將校擔任軍事教官，組織軍事協會等事，也純屬虛構。不過二、三流亡者抵達日本之初，曾企圖在此間向心學業，開拓知識。其後結果如何，尚不明瞭。”^⑬袁政府最初的外交交涉，就這樣被日方搪塞了過去。又如1914年3月20日，廣東都督龍濟光電告北京，“稱孫文、陳炯明、胡漢民、鄧鏗來、朱執信、洪兆麟等均到香港，遣其死黨，運款來粵，分往各屬，勾誘土匪，運動軍警，希圖起事。又有日本人四名，聞皆退伍軍官，來往省港，行蹤無定，聞由亂黨勾來，互相接洽。”^⑭27日，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將袁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轉來的這份電報加上廣州當地報紙的有關報道用密函轉呈外務大臣牧野伸顯，提請日本政府注意。

“浩然廬”爆炸事件發生後，袁政府就抓到了日本軍人幫助中國革命黨人開展軍事活動的確

切證據。1914年7月1日，駐日公使陸宗輿正式照會日本政府：“……大森浩然廬學舍秘密結集專習暗殺之術，本公使曾奉本國政府訓令兩月前曾委劉崇傑秘書面告小池（張造）局長，請求貴政府查明解散，以杜後患。日久未蒙賜復，今果在千葉縣發現炸彈，是該亂黨等竟以貴國地方為謀亂本國之策源地。犯證昭著，必非貴國政府容留該黨人之本意，且大違犯貴國之法律及治安，深望貴國政府……對於謀害中國之亂黨及大森浩然學廬之機關應如何取締解散以示嚴明之處分，則所以增兩國之親睦，保東亞之平和者當感貴政府盛意於無既矣。”⁸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同樣意思的備忘錄。8月9日，外交次長曹汝霖在同日本人桑田山藏非正式交談的時候甚至還提出了袁政府願意以出讓中國利權的方式，換取日本政府對革命黨人活動加以鎮壓的建議。至此，“浩然廬”爆炸事件演變成中日兩國政府間的外交糾紛。

就在袁政府提出第一次照會同一天的7月1日上午，浩然廬召開職員會議談論善後對策。下午3時，全體學生被召集到禮堂，“負責人青柳勝敏宣佈：由於此次事件，浩然廬於今日宣佈解散……另，此次證書授予者（指在浩然廬“學習初級軍事學結業”的證書——引者）中，有下記四十三名比較認真的學生，將仍然住宿在浩然廬的宿舍裡，在休學一個星期以後，暫不取任何名稱，僅以青柳勝敏私塾的方式繼續其學業。其講授課程有：戰術學、應用戰術、野外要務令、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交通學等等，另外術科課程有：體操、柔道、劍術三科。”⁹關於關閉浩然廬的原因，青柳勝敏已經說明是由於爆炸事件的影響所致，但青柳等人採取了“明關暗不關”的陽奉陰違的手法，可見關閉浩然廬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來自外交方面的壓力。

對於日本軍人參與中國革命運動，日本軍部採取了放縱和暗中支持的方針，及至發生外交糾紛時則出面表示這些活動均屬個人行為，與軍方無關，從表面上撇清事件與日本軍方的關聯。但是以外務省為首的日本外交當局則把維持政府間外交關係的正常狀態放在首要位置，因此時常對軍人們尤其是預備役軍人們以“個人身分”開展的這些“民間外交”抱有疑慮和不安。因此，“浩然廬”爆炸事件發生後的8月15日，外務省政務局發布《號外七》，宣佈要對“收容支那學生之法政學校及青柳塾加強戒備，使用間諜，查明搜查中未明之真相”¹⁰。青柳本人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在8月19日和20日連續兩次對警方派來的監控人員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有人說，近來支那第三次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很快就會乘歐洲動亂之機發動起義。但事實並非如此。現在革命黨內部完全無望獲得資金（援助），首領們也多分散在各地，僅有東京的孫文、陳其美以及京都的譚人鳳等留在日本，並且步調也不一致。……最近，孫文僅籌集到兩千元資金，用於生活費支出尚顯不足。（本月）14日，孫派使者周應時拜託我商借十萬元借款，我無計可施。當然，（日本）政府如果亮明幫助革命黨的態度，則會在投機界（人士）中產生若干影響，或許會有人出來投資。否則，目前的狀況只能令人感到絕望。支那內地下個月若發生洪水或者乾旱，暴徒揭竿而起，則會出現絕佳的時機。孫文一派如果與之聲息相通或者直接加以煽動，便可堂堂舉起革命大旗。目前則根本沒有這種可能。因此，革命的時機雖然已經成熟，但世間所宣傳的（中國）將要發生某種變動一事則不過是無稽之談。¹¹

就本人同支那革命的關係而言，（本人）常與日本政府的警憲共同行動，同外務省及陸軍省當局也氣息相通，專心為國家盡力至今。若偏離政府方針而擅自舉事，則苦心孤詣之努力必然化為泡影。尤其當（日本）政府態度未定之際若發動舉事，因支那士兵全為僱傭軍隊，軍費不足成功則無望。孫文雖然似乎還在為此頻繁地活動，本人則唯有致力於教育支那學生，靜待時機的來臨而已。¹²

8月19日的談話重點介紹了中國革命黨內部人心渙散和經費無著的窘況，強調了中國國內的革命時機雖然已經成熟但是革命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實，提示日本如果希望中國的政局發生變動，政府或者民間就必須從財政上援助革命黨，以便抓住這稍縱即逝的“良機”。這段話的內容，顯然同《意見書》及其附錄上的意見遙相呼應，是青柳勝敏等人在這個時候為日本政府獻上的對華“妙策”。8月20日的談話則完全換了一個角度，強調自己的行動既沒有同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不一致的地方，也沒有忘記隨時同警方和憲兵暗通情報、保持聯繫的義務，一副拼命洗刷身上的革命“嫌疑”，表明“專心為國家盡力”的姿態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

《意見書》及其附錄以及浩然廬爆炸事件相關的材料，為人們了解二次革命前後青柳勝敏之類日本軍人介入中國革命運動的動機和目的何在提供了直接的憑證，但是要闡明青柳本人在對華政策上的根本認識和此後不久他又投身於所謂“滿蒙獨立運動”的根本動機，還有必要對他在創辦《大東》雜誌，提倡所謂“大亞洲主義”的第一階段的有關言行作些相關的梳理。因為在第一階段形成和表現出來的政治主張，實際上成為貫穿青柳勝敏一生政治活動的指針。

根據外交史料館現存的若干期《大東》雜誌的說明，該雜誌從第四年第一號（明治44[1911]年1月1日發行）起改為“亞細亞義會”的機關刊物，編輯兼發行人（中野常太郎，號天心）、印刷人（山田英二）、印刷所（博文館印刷所）等跟此前並無變化，不同的是發行所從“大東社”變成了“亞細亞義會《大東》發行所”（地址也隨之變更）。由於現存雜誌中沒有創刊號，第一年和第二年的雜誌也全部闕如，因此，青柳勝敏就是這份雜誌的創始人一說無法得到證實。不過，現存各期上時常可以看到青柳參與署名的聲明等和他本人撰寫的文章（如《大東》雜誌第四年第三號起就刊登有青柳勝敏撰寫的連載文章《日本的騎兵》），他同這份雜誌的關係之密切當無可懷疑。

《大東》雜誌提倡的所謂“大亞洲主義”，可從第三年第四號的社論《覺醒吧，亞洲十億萬的民眾！》得窺一斑。社論首先論述世界發展的大勢是：十七世紀之前是“東力西漸”的時代，而十七世紀之後西力開始東漸。現在的亞洲已非以往的“大亞細亞”，三分之二地區的主權淪喪於歐美各國，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勉強維持現狀。唯有日本一國擁有先進和“領導”的地位，與歐美的“一等強國”並駕齊驅。但歐美強國中有那麼兩三個國家對日本心存嫉妒，公開或暗地裡使用離間、中傷和壓制等各種手段，日甚一日。日本應當如何應對這種局面？這篇社論指出：

在此，我日本應當本著道義至上的王者之道，指導鄰邦，興廢邦，繼絕世，任其盟主，以號令天下。然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卻面臨著極為困難之局面。但是，依靠我日本之手腕，不管遇到何等難關困境，也必須加以克服，徹底實現這一目的。替天行道，給世界以清平，這正是我日本皇國之天職矣。^⑤

以救世主的身分“拯救”亞洲，充當亞洲各國的盟主，這正是從明治末年以來風行日本社會的“支那保全論”之類“大亞洲主義”主張的特點。這類主張追求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存在著上位主體（中央政權或者佔支配地位的大國）的國際聯合體，其內部則是奉天皇為主宰、尊日本為主導國家的統治和被統治、從屬和被從屬的不平等關係。^⑥這種主張同日本軍部後來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一脈相承。

社論接下來卻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國：“一戶之家，一人無法成為組織，必須父母妻兒

傭人等相互協作，方見一家之安泰。一村，一鎮乃至一個城市亦然，一國，一洲自然亦不能例外。然而看近來亞洲尚保持獨立或半獨立地位的三分之一國家的情形，則反此理想而行動者在在皆是。尤其是鄰邦的清國，此種情形最甚。”^②當時的中國究竟是哪些方面讓青柳等人感到如此強烈的不滿呢？那就是日本“誓為鄰邦一掃欲逞狼吞虎噬野心之賊國”的“道義精神”和“國是方針”，時常受到從清廷的外交決策者，高級官僚到一般民眾“極無常識的懷疑”。中國朝野普遍存在的“恐日”、“疑日”的心理，被目為日本實現其亞洲盟主理想最大的障礙。

作者接著運用以下的推斷，來證明中國朝野各界的“恐日”、“疑日”心理是何等地“缺乏常識”：“清國得以保全今日之社稷，不受他邦之侵略，維持現狀而不倒，究竟依靠誰人之餘蔭？無庸贅言，乃因我國巍然立國於東亞之故也。如日俄（戰爭）之役，從我邦立場出發來看，豈非注重鄰邦之誼而發動的道義之戰爭耶？當時如果不幸戰局逆轉俄國得以取勝，則現在之滿洲早已不是清國之滿洲，清廷從此也無法將‘滿洲乃我祖宗發祥之靈地’之類口頭禪掛在嘴上，尚有何面目面對其祖宗之靈廟？”^③這樣，作者就將中國朝野各界產生“恐日”、“疑日”心理的責任，全部轉嫁到了中國方面，日本則成為備受他人懷疑、敵視而不慍的“道義國家”的化身。

社論在最後，點明“亞洲的覺醒”關鍵是中國的“覺醒”：“是故當此之際，清國唯有杜絕齷齪之舉，對內緩和民心，對外戒備邊境，外交事務上尤其是同歐美交涉時，密切與我邦私下計議，傾聽我邦的忠言指導周到處理，深信一旦有事遠親不如近鄰的格言且忠實執行之。如此，日清兩國由形而上之心產生親和感，雖需逐漸培養感情，最終卻能導致眼下僅剩三分之一的亞洲，恢復以往完整之亞洲。……眼下的西力東漸之局面，一變而為東力西漸之局面，亦易如反掌矣。清國如果能夠猛然覺醒，則南亞、中亞、西亞各國也會望風響應。如此，時機一旦成熟，我邦便可成為盟主號令天下，不必再對任何國家心存敬畏。”^④

從明治時代中後期的頭山滿、荒尾精等大陸浪人到日本侵華戰爭前後的石原莞爾等關東軍參謀將校，對近代日本能否依靠自身的力量同歐美列強進行對抗乃至展開最後的決戰始終忐忑不安。而控制乃至佔領整個中國，從資源、人口、地理縱深等各個方面克服日本自身的弱點，變島國日本為亞洲大陸大國的日本，就被他們看作實現這一野心的關鍵。頭山滿等人對於中國革命黨人的“同情”和“支持”，石原莞爾等人對於“東亞聯盟”主張的提倡和實踐，無一不是為了實現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而日本軍部的大陸政策以及戰前日本歷屆政府採取的對華政策，從基本方向來說同這些民間的、非主流的言論和主張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不同的只是官方的、主流的政策和主張隨時還要考慮到更多的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和牽制，因而在其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在狂熱和激進的軍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看來未盡理想、並不如意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從大陸浪人到石原莞爾等現役軍人，或者組織民間團體，召集集會，出版報刊，動員輿論向政府施加壓力；或者自行到中國蒐集軍事、政治、經濟情報，撰寫意見書、報告書等，向政府和軍部獻計獻策；或者接觸和直接介入中國的非主流、反體制力量，物色和扶植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人物，施以恩惠，培養親日感情和對日本的依賴心理，以便控制未來中國政治的走向。當政府或者軍部制定的對華政策在他們看來顯得過於“軟弱”或者有嚴重缺失的時候，他們還會以激烈的言辭和行動“抨擊”官方，以暴力和暗殺手段來消滅反對自己意見的對手。但是更多的情況下，他們還是從民間的、個人的角度出發，主動地承擔官方外交所不便處理的一部分高風險、高隱蔽性的活動，從側面彌補官方外交之不足，以保證日本的整體對華外交在中國政局發生任何變動時，都能夠應付裕如，獲得最大的“收益”。這就是大陸浪人們津津樂道的對華“民

間外交”，即近代日本對華“多元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辛亥革命時期青柳勝敏等日本軍人們的種種活動，也無一不是此類所謂“民間外交”中的一個環節。

- ①⑦俞辛焯：《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0、488～489頁。
- ②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列傳，出版地：東京：原書房，昭和52年重刊，第796～797頁。另外，原文中使用的“支那”、“滿洲”等詞彙，為保持史料原貌，一概未作更改，下同。
- ③按青柳勝敏1900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同期的杉山元、畑俊六後任陸軍大臣，小磯國昭軍銜至大將，另外軍銜至少將以上的人至少有9人。
- ④參見段雲章編著：《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1914年部分有關紀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2～414頁。
- ⑤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1-2-155，日德戰爭期間帝國臣民之對支政策及其他意見書雜纂：10意見書附支那革命黨現狀》，以下引自該文者不再另行註明。
- ⑥如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1-00840347，日俄戰爭之際帝國臣民對支政策及其他意見書雜纂第一卷》裡，就有署名松本良平者提交的意見書，宗旨與青柳勝敏大同小異。此外，內田良平等大陸浪人也有類似主張，參見拙稿《辛亥革命前後的內田良平》，北京：《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 ⑧援助革命黨人在華南舉事究竟需要多少金錢？當時日本方面的“支那通”們其實也是眾說紛紜，沒有定見。參見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8，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二卷》1。
- ⑨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8，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二卷》2。
- ⑩⑪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7，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一卷》4。括號內均為原註。
- ⑫⑬⑭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8，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二卷》3。標點為引者所加。
- ⑮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5，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一卷》3。
- ⑯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7，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一卷》2。
- ⑰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9，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三卷》1。
- ⑱《乙秘第1536號 8月19日 青柳勝敏談話》，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9，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三卷》1。
- ⑲《乙秘第1543號 8月20日 青柳勝敏談話》，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6-1-059，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包括流亡者）第十三卷》1。
- ⑳㉑㉒㉓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紀錄B-1-3-1-112，亞細亞義會關係雜纂》。
- ㉔參見拙稿《“吾人之大亞洲主義”辨——再論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專輯《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論文集》，第154～155頁。

作者簡介：趙軍，日本千葉商科大学商經學院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